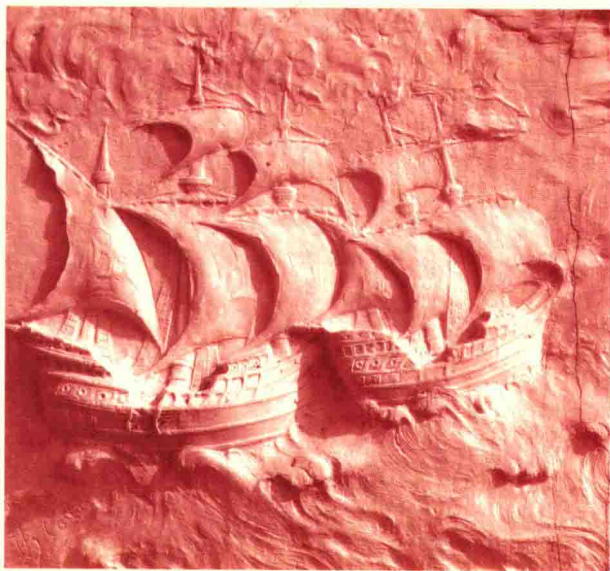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

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

顾卫民 著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Pacific Ocean**

Goa and Macao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

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

顾卫民 著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Pacific Ocean**

Goa and Macao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顾
卫民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458-1233-6

I. ①从… II. ①顾… III. ①文化传播-文化史-研
究-印度、澳门-16世纪~18世纪 IV. ①K296.59
②K3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0497号

责任编辑 孙 莺

封面设计 郇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

顾卫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41 字数 600,00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233-6/K·217

定价 98.00元



《里斯本全景观(局部)》(Panoramic View of Lisbon), 蓝白色瓷砖壁画, 制作于里斯本, 时间约在 1700 至 1725 年之间, 宽 115 厘米, 长达 2247 厘米。它忠实地展示了 1755 年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的城市景象。河岸前方的建筑物为海关以及设有大炮的圣若奥要塞(Fort of S. João), 广场左边的建筑物为王宫以及以前的“印度房”(Casa da Índia), 最左边的地方可以看到王宫的阳台。该瓷砖画目前保留在里斯本国立蓝色瓷砖画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



果阿主教座堂正立面。它始建于1562年,完成于1651年,设计者和建筑师为诺曼人的后裔西芒(Júlio Simão, 1565—1641)。它的主祭坛奉献给亚历山大城的圣女卡特琳娜(St.Catherine of Alexandria, CA.282—305),因为葡萄牙人于1510年11月25日攻占果阿,这一天是圣卡特琳娜的主保节日。堂内共设有十五座祭坛、八座小教堂,中堂长达76米,原有两座侧塔,北面的侧塔于1776年倒塌,其正立面带有意大利托斯卡尼风格,同时又是葡萄牙—印度巴洛克风格的杰作,对于后来果阿地区的教堂建筑具有示范作用。作者摄于2004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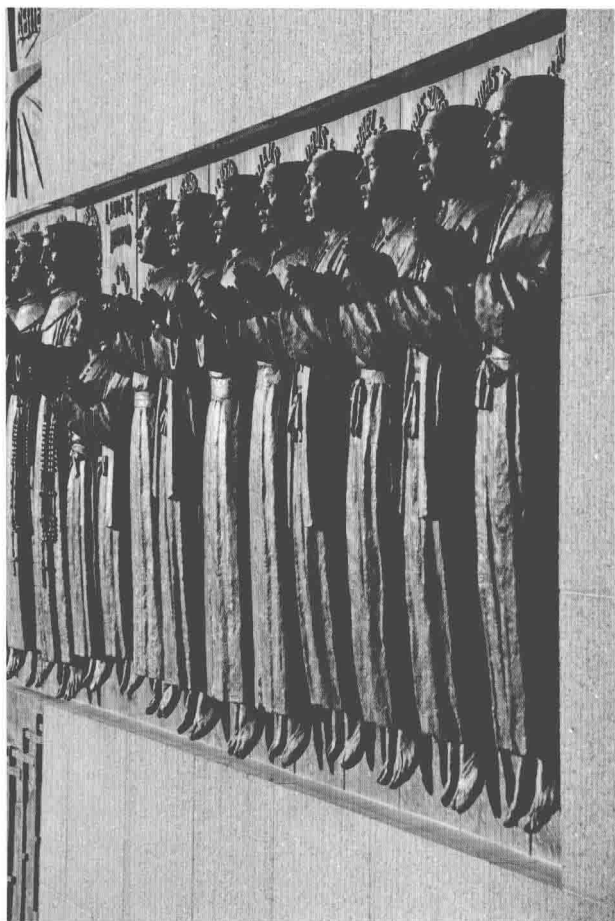
《沙勿略遗体被运回果阿》，木板画，17 世纪，保存在毗邻果阿好耶稣教堂 (Bom Jesus Church) 的耶稣会会院的二楼回廊墙壁上。沙勿略于 1552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凌晨在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去世。他的遗体先埋在该岛，1553 年 3 月 22 日被运往马六甲，1554 年 3 月 16 日被运回到果阿，最初保存在果阿圣保禄学院教堂。1624 年，遗体被安放在果阿好耶稣教堂中。图中描绘沙勿略遗体运回果阿时人们打开棺木察看其遗体的场景。2013 年 1 月作者摄于果阿。



澳门第一任主教耶稣会士贾耐劳(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 1516—1583)的石雕像,安放在澳门仁慈堂。作者摄于2009年11月。



澳门仁慈堂的仁慈圣母像浮雕，原保存在澳门仁慈堂，现保存在澳门民政总署(原议事会)大楼。



日本长崎二十六圣人纪念碑，树立于1962年6月，以纪念1597年2月5日被丰臣秀吉下令杀害于长崎西坂山坡上的二十六名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天主教徒。由日本著名雕塑家舟越保武(Yasutake Funakoshi, 1912—2002)创作。作者摄于2015年2月。



面向大海的位于日本九州东部的原城遗址。作者摄于2015年2月。从1637年12月至1638年4月,日本九州岛原和天草两地爆发大规模反抗日本幕府的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固守原城,幕府调动十余万大军最后将起义镇压下去,并要求荷兰人从海上以重炮轰击原城。事变中死亡民众达二万余人,史称“岛原之乱”。“岛原之乱”并无葡萄牙人的直接指使,但是幕府最后下定决心关闭澳门与长崎之间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贸易航线,并驱逐所有在日本的葡萄牙人。

序 一

不久前,卫民告诉我,他撰写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五个城市(里斯本、果阿、澳门、马六甲、长崎)的文明和西方传教士之间关联的书籍将会出版,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反映了他在基督教东渐史的研究上开拓了新领域。但他要我为他的书写点什么,却使我颇感为难。因为我在这方面所知甚少,发表不出有学术见解的评论。推辞再三,他仍执意要我以年长十岁的“老大哥”身份写几句勉励的话。于是,不得已写下这篇序。

记得第一次见到卫民,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的办公室,我们都去那里办理有关出境访问的事宜,在等待工作人员的时间里聊了一会儿,从中得知他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陈旭麓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史,毕业后在上海教育学院任教,后来随同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大而来到华东师大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天主教史。沉潜、笃实是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我的研究领域虽然是中国哲学史,但在读研究生期间,遵从业师冯契先生的安排,完整地听过陈旭麓先生讲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大概是这门课最早的听众之一;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对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有所涉及。这样无形之中,似乎就有了师兄弟加同行的亲近感。此后,我对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关注,觉得他在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2003年我到台湾访学2个月,其间读到台湾学者的相关评论,证实了我的看法。我曾在一篇《台湾学者对近20年来大陆宗教学研究的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中,转述了台湾一些学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相当高的评价。文章发表后,我曾将刊物送他一份。不过,他对此似乎并不很在意,只是埋头于学问。2002年前后,我和他都离开了华东师大,他去了上海大学,我去了上海师范大学。然而,没有想到的是2006年他也来到了上海师大哲学系,与我成了同事。这样,对于他的学术旨趣也就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读了卫民的书,使我想起其师陈旭麓先生的话:“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评

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①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说是笼罩在重重的历史迷雾之中，对其也有种种褒贬不一的评论，如果没有治史的眼睛，很难不被迷惑和捉弄。还是陈旭麓先生讲得好，“史识是治史的眼睛”。^②我体会到卫民治基督教东渐史的史识是：从地理大发现的宏观历史背景出发，对基督教在东方社会的影响作微观的考察。如此的“眼睛”使得其研究成果在宏观中能具体，在微观中有通识。这在他以往的著作中已有体现，而在本书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从这几本书中可以看到：由探讨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为起点，以五个具体的城市为载体；从都市制度、城市布局、贸易结构、宗教形态、建筑风格、生活方式这些微观方面入手，指出五个城市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段中的紧密联系。这样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一方面向读者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五个城市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提炼出基督教对东方文明最初产生影响的某些共同性的特征。因此，我认为这里不只是对历史的描述，而且蕴含着对历史的识见。

我的另一感想是，如何看待西方传教士在东方的作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往往把西方传教士定性为殖民侵略的附庸和文化侵略的代表。由此来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地理大发现引发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传教士随着这一浪潮而踏上东方的土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印记。因此，近代中国人民把反洋教作为反对殖民侵略的组成部分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但是，类似义和团那样的群众性反洋教斗争，尽管有促进民族觉醒的作用，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民族觉醒。因为它们以爱国主义的正当性掩盖了愚昧盲目的落后性。简单地把西方传教士等同于殖民侵略者，实际上是没有摆脱义和团式的反洋教。这意味着对于来到东方的西方传教士群体以及他们个人需要作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应当说，卫民的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精神。例如，一方面指出了传教士东来与殖民扩张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移植到东方殖民城市的市政厅和仁慈堂，给那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代议制的形式。如此的具体分析对于研究基督教东渐史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其间容易夹杂民族情感，也因为殖民者和传教士作为个体往往具有多面性。例如晚清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十分支持对于义和团的镇压，这是其在以往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者爪牙的重要理由；但他也反对西方人对

① 《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47—1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的傲慢偏见,其著作《汉学菁华》有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在评价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上,义和团式的反洋教可以说已经被摈弃了。然而,我倒是隐约感觉到了现在有另一种倾向,即某些关于基督教东来的论著,对其殖民主义的背景刻意地加以回避了。这也是不足取的。

近三十年来,宗教对于中国精神生活的影响力无疑是增大了很多,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记得陈旭麓先生曾在回答“您认为不学历史的最大害处”这个问题时,这样说道:“不学历史一样吃饭,学了历史饭可能吃得好一点。”但是,“这样写,人们会觉得滑稽,乃改为:缺乏历史知识的行为是盲目的,盲目性给个人与社会都会带来损害。”^①卫民撰写的书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知识,显然是有助于减少对于宗教认识上的盲目性。

陈卫平

2009年6月

^① 《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45—14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序 二

15—16 世纪无疑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那个时代以朦胧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博大精深的历史决定论,注定了以后数百年间历史发展的大致方向和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诡谲的“理性狡计”往往通过一些小人物的惊世之举来昭示自己的宏伟计划,1517 年 10 月 31 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修道士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前贴出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19 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把 1521 年 4 月 17 日路德坦然出席凶险四伏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举称为“现代欧洲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场景”,认为“英国清教、英格兰和它的议会、美国人和这两个世纪的巨大工作、法国革命、欧洲及其目前每一个地方的工作,所有这一切的胚芽就在这里。如果路德在此时做了别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就是别的样子”!^①如果说维登堡的小修道士马丁·路德所开创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历史进程,最终导致了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生长、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②,那么同时期南欧伊比利亚地区的一些航海探险家所推动的地理大发现活动则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基本面貌。当巴特洛缪·迪亚斯、瓦斯科·达·伽马、阿方索·德·阿尔伯奎克等葡萄牙探险家和哥伦布、麦哲伦等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航海家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劈风斩浪时,他们的主观动机只是为了到印度去“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然而他们航海活动的客观后果却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浪潮,开

^① 参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第四讲:教士英雄”,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历史后果都是从客观意义上来说的,在主观动机上,路德的初衷只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纯洁性,革除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腐败和虚伪。

启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历程。

15—16 世纪对于亚欧大陆的各大文明体系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枢纽性的时代公平地呈现在各个传统文明圈的人们面前，谁把握了它的基本脉络，谁就控制了未来几百年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当时亚欧大陆的三大文明体系——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方的儒家文明以及地处二者之间的伊斯兰教文明——都在试图突破传统的生存空间，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伊斯兰教文明，尤其是代表着该文明之强劲势头的奥斯曼帝国在陆地上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那些凭借金戈铁马横扫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们高声宣称：“真主把陆地交给了穆斯林，至于海洋，就留给基督徒吧！”在陆上军事对抗中处于守势的西方基督徒则不得不转向被穆斯林遗弃的海洋，试图开辟一条海上通道到东方去寻找基督教同盟者和攫取物质资源。无独有偶，就在西方基督徒被迫走向海洋的时候，处于天朝大国意识之下的中国大明朝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下西洋”活动。

相形之下，明朝中国人的海外探险活动，不仅在时间上要早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半个多世纪，而且在船队规模和装备水平等方面也远比后者强大。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船队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洋上战胜穆斯林的船队，控制东方的香料贸易，并在果阿、马六甲、澳门等地建立起殖民贸易据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船体坚固、火力强大的武装商船。那些长 30~50 米、宽 10~17 米并配备有青铜火炮和长筒猎枪的葡萄牙三桅船和大帆船，在当时的印度洋上是所向披靡、不可战胜的。然而早在 1405 至 1433 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时所率领的船队，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战斗力上来说，都足以让葡萄牙人自愧不如。据数次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翻译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所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这些宝船、马船、战船船体坚固精美，桅杆高耸入云，并且配有大量的喷筒、火炮和火铳之类的热兵器。1497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去发现印度时，所率船只仅四艘，船员不过 170 人；1510 年阿尔伯奎克征服果阿时，所率舰队也只有 20 艘大帆船和 1 200 名士兵。但是 1405 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所率船舰竟达 63 艘（一说 62 艘）、人员 27 800 名。如此规模的“下西洋”活动，从南中国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一直到达非洲东海岸，可谓声威浩大、势不可挡。汤因比评论道：

在 15 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

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①

然而,1433年明朝政府却发布了一道敕令,禁造远洋航船,停办海外采买,轰轰烈烈的海外探险活动从此偃旗息鼓。而明朝政府之所以要发布这道敕令,一来是由于航海活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二来是囿于务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再加上北方边境蒙古人攻略不已、东南沿海又频遭倭寇骚扰,因此就干脆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缩起头来“专图自治之策”,哪还顾得了伶仃洋外的惊涛骇浪。从那以后,这“中央帝国”的国门一关就是四百年,直到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才把它重新轰开。

就在“中央帝国”心甘情愿地把宽阔的海洋关闭在国门之外时,地处西南欧边陲之地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则当仁不让地走向了海洋,拉开了殖民时代的序幕。步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后尘,在西北欧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荷兰等也纷纷加入到海外探险和殖民贸易的时代热潮中,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成为把分散的区域史、国别史整合为有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重要中介,而征服海洋、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活动则成为人类文明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化的根本标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道: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②

发端于15、16世纪的西方海外探险活动,最初既不同于古代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的军事扩张,也不同于中国航海者向海外番邦小国宣扬大明朝恩威的“政治作秀”,而是为了攫取东方富饶的物产资源(香料、象牙、丝绸等)和寻找传说中失散于海外的基督徒(以便共同对付强大的穆斯林)。到了英国、荷兰等新兴的殖民主义者开始崛起之后,随着欧洲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需要日益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以掠夺和垄断海外资源为特征的葡萄牙、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